

费孝通全集

第十一卷
(1985)



费孝通全集

第十一卷
(1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费孝通全集 · 第 11 卷, 1985 / 费孝通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 - 7 - 204 - 09796 - 8

I. 费… II. 费… III. 费孝通(1910 ~ 2005) — 全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3234 号

费孝通全集

费孝通 著

责任编辑 王东生 王占英 王继雄

责任校对 县 翔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292

字 数 702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套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09796 - 8 / C · 209

定 价 880.00 元(全 20 卷)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费孝通在专心写作

本卷说明

本卷收录了作者 1985 年所撰写的文章。这一年，作者受命组建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并任所长，围绕着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发表了几篇重要文章，并将自己从事社会学研究五十年的经验和体会写成《社会调查自白》一文，由知识出版社出版。

与此同时，作者还多次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进行考察，撰写了《西部经济发展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等一系列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政协小记》系列文章也是这一年有影响的著作。

本卷的文章一般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对同一课题的系列文章，为保持其连续性，我们予以适当集中。在编校上，除对个别明显的排印上的错失予以纠正外，其余一律存其旧貌。

目 录

致胡耀邦信	(1)
知识分子要做“二传手”	(3)
社会调查自白	(6)
我们的事业会永远发展下去	(85)
社会学学科建设与规划	(88)
再谈社会学学科建设与规划	(95)
谈社会调查	(101)
重建社会学的又一阶段	(105)
开展为内蒙古发展服务的调查研究	(114)
谈谈边区开发的科学研究	(118)
包头篇	(126)
西部经济发展和各民族共同繁荣	(143)
开发甘南的意义和建议	(150)
定西篇	(159)
甘南篇	(177)
悼愈老	(200)
能登三日记	(203)
要继承和发扬学以致用的传统	(217)
发挥老年知识分子的作用	(219)
对“一国两制”的理解	(222)
关于天津市老龄问题的研究	(225)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	(230)

政协小记	(235)
迎新枝	(235)
善本·名画·集邮册	(236)
小测验——对教育改革的意见	(238)
速不忘稳	(240)
挖穷根 破迷信	(241)
港胞三愿	(243)
群言集锦:工资和物价	(244)
“重放光彩”	(246)
认识政协	(247)
清明寄语	(249)
实现民族事实上的平等	(251)
办学要讲效益	(252)
谢幕语	(254)
《小记》后记	(256)
残疾人需要学习和就业	(258)
农民头脑里的变化	(261)
喜马拉雅山,还是独秀峰	(266)
港行漫笔	(268)
念抗日胜利者	(285)
潘光旦先生关于畲族历史问题的设想	(287)
《中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序	(292)
费孝通《社会学文集》自记	(298)
人口与开放	(301)
一段文字因缘	(303)
开发智力 为虎添翼	(305)
九访江村	(306)
林则徐小传	(328)

改革年的新胜利	(330)
下好中国人口问题这盘棋	(332)
从“江村”到“温州模式”	(336)
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	(343)
闽江口速写	(352)
说草根工业	(364)
谈写作答客问	(367)

致胡耀邦信

耀邦同志：

最近，民盟中央就高等教育的改革问题召开了几次座谈会。我又去福建的漳州参加了民盟九省市普通教育改革研讨会。有几点意见想向您汇报：

一、现在教育战线，特别是中小学方面，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隐忧，就是“人心思改”，再不改革，许多教师就要改行。客观形势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迅速发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行，广大工农群众逐步富起来了，而各级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的生活水平和农民、工人的差距更扩大了。他们大多数人在经济上穷困，精神上缺乏鼓励，工作上得不到安慰。教育战线上已开始出现智力流失的趋势。这是不容忽视的，必须及时地、大力地、坚决地采取措施，把这种情况扭转过来，稳住教育战线的阵脚。

二、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此事体大，内涵复杂，影响久远，不可能在很短期间立见成效。当务之急是在找出一个改革的突破口。我认为这个突破口就是要稳定和提高教师的地位，特别是巩固中小学教师的队伍，具体地说，必须乘教育改革之风，采取富有震动性的措施，一新耳目，使教师恢复信心，树立光荣感。除着实提高他们的政治待遇外，还要在经济上、物质待遇上使中小学教师和高等院校的中青年教师有显著的、惹眼的提高；大造舆论，促使全社会都建立起尊重知识，尊重教师的优良风气。以目前情况来说，中小学方面虽然情况比较严

重和突出，问题还是比较简明，上述要求如能实现，效果也容易见到。至于高等教育，情况更为复杂，具体改革方案，不宜操之过急，似宜先规定若干改革原则，统一思想，然后经过深入调查研究、酝酿试点，逐步推开。

三、实现上述措施必须考虑国家当前实力。我充分体谅政府一时拿不出很多钱来办教育，因此建议首先明确规定教育经费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应占的百分比，并宣布逐年增加的尺度，争取于2000年不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然后按此百分比（起点低一些不要紧），定出每年预算。如果国家力量不足，不足之数可发行教育公债，多渠道向民间（包括华侨）集资，可于本世纪末还本付息。我深信，广大人民群众具有强烈的爱国之心，而且每个父母也都在为子女的教育操心担忧，千家万户一定会踊跃响应。此举亦可表明我们国家重视教育的决心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从而激起全民为教育事业出力的高潮。

随函附上民盟中央整理的《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几点建议》、民盟九省市普通教育改革研讨会拟定的《关于城市普通教育改革的几点建议》及《当前普教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反映材料》各一份，请一并审阅。这些材料是来自群众，经过讨论写成的。他们的某些建议，可能超越现实的可能，但确也表示出一种急切的期望。

此致
敬礼

费孝通
1985年1月15日

知识分子要做“二传手”

最近去福建跑一趟，民盟9省市关于普通教育改革的会在漳州召开。我说我是去提货的，他们仓库里货色多，很丰富，我们要提出来用。他们搞的是城市普通中学教育改革的建议。党中央在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下一步要搞教育改革，科研改革，民盟同志们提出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的建议，适合需要。

现在各地都在办学校，江苏的沙洲办个工学院，钱伟长是名誉院长；四川的凉山大学，我是名誉校长。都是地方自己办起来的。水已经到了，渠还没有成。我们大家赶紧出力量来修渠。这是我们民主党派的任务。高等教育方面的讨论，陶大镛同志主持搞的，我也参加了一点，主要是民盟北京市委和盟中央文教委员会，搞出来一个建议。去福建提货，是普通教育改革的建议，大家加班加点，积极性太高了。很快搞出材料，还有附件。

我个人感到，教育是百年大计，兹事体大，关系几代人。要改好，必须看得远，看得全面。从江苏农村来看，经济发展如山雨欲来，势不可挡。教育可没有这么快，百年树人嘛。我们得到信息，党中央正在研究教育改革问题。我们提点建议，希望能及时，别成了马后炮。12号我从漳州赶回来，我这个“提货专员”，当夜把货送交执行局验收。我们开个会，说光这么送给党中央去，恐怕印象不深，最好加一点东西，几个副主席联名写一封信。我起个草，可是时间来不及，就写我一个

人的名字吧，我是民盟中央副主席，还是代表民盟的。在这封信里，我说教育势在必改，怎么改呢，要找个突破口，找个着手之处。我说整个教育战线都重要，但首先要抓住人，抓教师队伍的稳定和提高。现在出现一个隐忧——我没用危机这种字眼，叫做“智力流失”很严重。自然界有水土流失，教育界有智力流失。上海的材料里有具体数字，各地都一样。这是必然的。商品经济来了，教师和别的行业工资差距太大，凭什么硬叫人家守着冷板凳？大学毕业生不向下分配，当然有人要出高价来请好的教师。

经济战线在发展，教育战线智力流失，行政手段没用，硬挡挡不住。所以我说“要采取震动性措施”，使社会上耳目一新，使人感到做教师真光荣，就要有经济基础，要拿钱出来。我们不是没有钱，是花法不对头，积重难返，大量的钱投入亏损企业中去了。我们当然要体谅国家财力有限，所以我提，先规定一个数目比例，应当以总产值的百分之几作教育经费。国家财政拿不出来，有个差额，由国民的力量来搞教育公债，包括华侨集资，到2000年还本付息。这条意见很具体，我冒昧地以个人名义提出建议。其他问题比较好谈。

学校搞“创收”，不得了。吴江一个中学靠搞六神丸的瓶子救命，作为国民一分子对此是痛心的。现在不只中学，大学都在搞。我看不如爽性发公债。有没有能力？社会上有钱？有游资，农村都在盖房子，叫他们先拿出点钱来培养自己的子女，再苦几年，把孩子教育好。

大概就是这样一些内容的信，已经送出去了。究竟效果如何？是不是马后炮？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从这里体会到民盟是可以做些事情的。仓库里有存货，办事情有效率，不是拖拖沓沓，有积极性。我听到在漳州宾馆里开另一个会议的同志们说：“民盟真行，佩服，佩服。”这也增加我们的信心。

中国正在发展，民盟能做什么？可做的事多得很。我刚刚参加一个大地建筑事务所的成立会，两位副总理请城乡建设部的部长出席。要同外国合作，搞各种样子的农村建筑。农村乡镇的市政怎么规划？房子造在什么地方？造多大？什么样子？有的乡镇工业花很多钱造大房子，影响它的资金周转。这是个民间的、国际性的建筑事务所。知识分子眼睛向下了。上边有政策，下边有力量，就缺中间一个：智力不足。这实际是在将我们知识分子的军，你要拿出东西来，拿不出来就搭不成桥。打排球，光有郎平不行，要有孙晋芳。知识分子队伍中要有二传手。

知识变成生产力要经过二传手。据内蒙古的调查，一个村子，改良一个新品种，要经过五道知识的阶梯。引进技术，引进新设备，不会用，放在那里放坏了，这是浪费呀！

我们不要讲大话，知识分子要做二传手，做孙晋芳。有人说，小城镇是科技下乡的二传手，农业中心的杜润生同志说是台阶。总之，差距太大，要搭个台阶，或者说要经过知识分子做二传手。

我们组织知识分子下乡，一切要为了发展生产。不要先培养杜甫、李白，先把生产搞上去。不要大讲尖端，那些现在还谈不到。生产力提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出来了。知识必须下乡，知识要变成生产力，必须有知识分子做这个事。民盟是知识分子组成的，应当做这个事。

总之，教育要改革，先要把教师生活安定下来。要有震动性的措施。福建会议上有人说：人心思改，不改革就改行。像过去那样子维持不下去了。

1985年1月19日

社会调查自白

1984年7月23日到8月4日的两个星期里，我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组织的暑期“多学科学术讲座”里作了有关社会调查十讲。盟中央组织这个讲座的目的，是在贮存和扩散老一辈学者致力一生所得的一些知识，免得失传，有损国家的智力资源。我虽是这个讲座的倡议人之一，但是自问论资论学都够不上格，只是主持其事的钱伟长同志一意坚持要把我列入讲员之列，实在无法推托，勉为其难，滥竽充数，自觉惭愧。我所做到的只是在相当炎热的气温下，总算没有迟到，没有缺课。至于所讲的内容，只是些平时我常讲的有关本人从事社会调查的经过和体会的话。

我在课堂上讲话的习惯是事前大体上打一个腹稿，上场后即兴发挥，缺点是不拘章法，不求面面俱到，长处是不受框框限制，使一些听众受到言外的启迪，激发自动的思考。这十讲并非例外。我只把自己过去所做的社会调查编排个次序，从民族、农村、家庭、小城镇到知识分子和智力资源，各讲一讲。讲我为什么想到做这些调查，怎样调查，又有什么体会。另有两讲是答复问题，共十讲。其中并没有多少技术性的指导，也说不上有什么高深的哲理，只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对自己工作的自白罢了。

我讲话时录了音，讲完后请听我讲的上海大学李友梅同志，根据她听讲的笔记，参照录音，整理了一个稿子。在这样炎热的日子里足足花了一个星期的紧张劳动，是很辛苦的。

我在此表示我的感谢。稿子到了我手上，照例压积在我的书桌上，腾不出时间来校阅。入秋，上海大学沈关宝同志来北京，我就抓住他帮我把这份讲稿看一遍。他觉得对具体的社会调查方法讲得太少，所以把第二讲重新编写一遍，补足了我这次讲话中的一些缺漏。同样要向他表示感谢。直到冬尽春至，跨了一个新年，我才挤出时间修改了一次。错失和疏忽的地方还是不少，只能请读者多多关照了。

一、引 子

为了在中国智力总库里留下老一辈知识分子学术生涯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为了我们这个通过新陈代谢而得以绵续长存的社会，民盟中央举办了这次“多学科学术讲座”。来这儿听讲的有全国各地的同志，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学习和讨论，我非常高兴，希望能得到好的收获。

我们正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正需加速智力开发以缩短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因此，科学地培养人才，合理地使用人才，就成为我国在全球性挑战中能否取胜立足的关键，这是当前最迫切的一项任务。人才培养，智力开发，要靠我们已有的智力库。在我们现有的智力库里，七八十岁的老知识分子已经为数不多了，而且属于他们未来的时间也不多了，这是自然法则，不可抗拒。我在 1980 年时说过一句话：“大概我身边只有 10 块钱了，一年用 1 块钱也只能用到 80 岁，到那时就做不了什么事了，即使活着也顶不上大用，用起来或许还会害人。”这样说是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属于自己的时间有一定的年限。这一点是年轻人感觉不到的，青年人往往把自己的生命与无限的时光等同起来，其实二者不是一回事，有时还会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日本电视剧《血疑》用的就是这样一个主

题：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活的时候会怎么样？这里不但有自己怎么办的问题，也有别人怎么对待的问题。这部电影的主题给人以不少启发。

70至80岁的这辈老知识分子的时间虽不多了，然而他们在中国智力结构里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他们受过严格的、有系统的教育，大都学有专长，各有成就。他们毕生积累的做学问的经验，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财富。现在他们年事已高，来日不多，再不把宝贵的知识传给后人，将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接班人的培养造成无法填补的损失。人死了，他的知识也随着去了，这是很可悲的。要知道，任何知识都不属于哪一个人私有的。它是全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是共同智慧的结晶。个人从社会里得来的知识应当回到社会里去，这就要靠代代相传。后一代要在前一代人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更新发展。这是一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过程，而不是计算机或电脑所能替代得了的。因此在老一辈本身来讲，除了充分发挥余热，继续做出贡献外，还必须主动地做好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使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得以延续和发展。

这部分老知识分子大多毕业于抗战之前的高等院校。那时有不少学校有浓厚的学术空气和良好的学习环境。他们在学校念书，也都有各自爱好的专业，大多能在博览各种书籍、广泛而又迅速地接触各门知识的基础上专门化。这种既有广度又有深度，二者相辅相成的知识传递方式，使学生一走出校门就能独立地进行科学的研究。因此，尽管此后战乱不断，社会环境险恶，大部分人还是在科学领域做出了成就。可惜的是，全国解放后我们对科学文化学习、传授的规律性东西不予重视。相反，在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作院系调整以后，理、工科分家，文、理科分家，搞专科分院制。学习各门专业的不强调普通数理化的基础，更谈不到文史的基本知识。攻读文科的不了解当

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新发展。进入了一个专科就不管其他科目了。学校的规章制度还限制了其他方面学习的机会和条件。过去清华、北大的课程就不像现在这样限得死死的，那时鼓励学生在学完必修课的基础上跨学科听课，窗台上都有人趴着听课。只要学校承认你是它的学生，听哪门课都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空气自然也就浓厚起来。大家碰头就能谈论交流，念人类学的遇上学语言学的马上就会说到一起去，和学生物的也能讨论一番。

所谓学术，就是人对宇宙实体的认识反映，物质和精神世界本身浑然一体，并没有分门别类。当然人在认识它的时候必须有分析，要有先后秩序；人们之间还要有分工，各有偏重，但人为分割的各部分之间是互相联系着的。假如我们把这种分割绝对化，单刀直入，只专一门，在某一个孤立点上做学问，那么就不可能真正揭示客观世界存在的奥秘，也就不可能有新的学术成就可言。比如学写文章应当学会写杂文。学术研究也应当搞点“杂文”。“杂”，就是多样化，多种学科的互相交流，互相渗透，融会贯通，全面发展，这样才能有学习和研究的深度。

当年，我们在大学里学习的时候，十分重视基础知识。就我自己来说，我的底子就不是现在一般的底子。我学医预科是准备上医学院的。那时医学制度要求两年预科、五年专科。预科就是打底子，包括自然科学的底子，如物理、化学，主要是生物、心理。还学哲学、逻辑、外文、国文，国文里还有版本学。我是在这个基础上转入社会学的。社会学念了三年又转学人类学。

人类学是一门知识广阔的学科，从体质到语言、到文化、直到考古。文化、语言、体质都有历史的纵向区分（如猿人、智人与现代人等）和地域的横向区分（如亚、非、欧等洲）。